

當資本主義邂逅臺灣女人 ——從階級視角反思當代臺灣 小說中的「女性」主題

林 運 鴻*

摘 要

從 1980 年代以後，臺灣的女性小說始終有著不俗的表現，同時也啟發了大量具有性別關懷的學術成果。然而，本文將選擇在臺灣文學研究之中較受忽略的馬克思主義視角，來分析當代臺灣的女性小說，以及性別主題內的「階級」面向。首先，本文討論的是，同時在職場與家庭中運作的父權意識形態，使得女性在公私領域的勞動無法獲得相應的報酬；其次，本文也要進入文學作品中的「浪漫愛」主題，浪漫愛不只是一種性別化的私密情感，它也同時回應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分化現象；最後，本文要同時考慮「階級意識」與「性別自覺」之間的矛盾與互相限制，這使得臺灣女性小說常在「階級」與「性別」兩主題之間呈現出一種張力，許多文本更為偏愛那些進步、自覺、反思性別關係的中產階級性別主體，而很少著墨於容易妥協、甚至內化父權的底層女性經驗。本文認為，對於臺灣小說中女性意識之考察，其實還必須深刻地去考慮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因素，並且小心對待那種在性別政治正確中，可能被忽略、消音、無從現身的底層女性。

關鍵詞：性別認同、底層女性、浪漫愛、階級意識、臺灣女性小說

2018.07.10 收稿，2018.10.24 通過刊登，2018.10.30 修訂稿收件。

*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副研究員

一、前言

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的巨大轉捩點。早在十六世紀，當重商主義在歐洲國家初露端倪，人類社會便以大規模國際貿易、甚至是以軍事征服為手段，開始追求財富的大量累積。工業革命後，物質生產和商業交換的技術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市場領域完整成型，純經濟的國度開始無限擴張。隨著貨幣、金融體系、商品生產的越加完善，原本自給自足的封建莊園體系被徹底摧毀，互通有無的資本主義成為經濟活動的基本原則，所有那些不同的文明與社會，如今都被捲入同一個巨型的生產與交換體制裡。¹

然而，儘管今日的資本主義經濟取得了以地球為尺度的壓倒性勝利，但這種經濟上的「革命」，卻不是所有人能雨露均霑。幾個老牌資本主義西歐國家、在世界史上新興的美國與日本，無疑是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最大受惠者。而所謂的「南方國家」、「第三世界」或是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說的「邊陲（the periphery）」，它們仍然是便宜原料或廉價勞力的來源，也是無情跨國資本的剝削對象。顯然，資本主義以及其帶來的「經濟現代性」，總是偏愛那些有權力的人群與地區。而本文中要思考的，正是不平等的性別範疇中的階級落差，也就是因為資本主義而更加惡化的女性處境。作為一篇本土的文學史研究，我們將要討論，在臺灣當代小說，「女性」被捲入「資本主義」的各種事例，以及性別與階級此二個範疇互相塑造的文學現象與歷史過程。作為第二性，她們一方面仍舊被各種傳統的職責與形象所束縛，另一方面，面對現代經濟，她們則是與男人一樣必須赤裸裸拋售自身僅有的勞動力。

一些近代史的經驗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資本主義社會裡的性別處境，例如，在資本主義擴張早期，原本在農村家庭裡，男人與女人互相依賴、共同勞動的傳統，就因為都市化而崩解。那些進入都市的婦女，她們逐漸被安置到私人的、居家的、家庭與消費的生活裡，而不是像過去那樣，與男人並肩於生產活動。²又例如，十九世紀的法國，女性在法律上是被視為未成年狀態。當時巴黎的年經女性們，要進入「現代社會」的「辦法」是，透過出售自己的身體與形象，例如女伶、妓女，才能以「性別商品」

¹ Fernand Braudel, 施康強、顧良譯，《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台北：貓頭鷹，1999）。

² Roberta Hamilton,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A Study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London ; Boston: G. Allen & Unwin, 1978), p.18-19.

的身分進入公共領域。當巴黎的街道隨著發展論取向、管制性的都市計劃而逐漸被改造，販賣各種流行衣裝的新式百貨公司也開始出現。而這種以時尚為名的「美的工業」，更提供了外型姣好的婦女各種類型工作機會，當然，這也是讓女性勞動力在「追求美麗」的規訓下變得更溫馴。³

再以當代臺灣社會的情況來說，臺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比起男性仍顯著為低、多從事次級工作、薪資與升遷機會也均處於劣勢，並且還須面對職場中的歧視與性騷擾。⁴可以看到，隨著臺灣社會的現代化、資本化過程，女性勞動力並不因為自由地釋放到就業市場中，就得到了真正的平等。這樣的現象當然有著複雜的原因，但是，所謂「家庭」以及傳統性別角色腳本，都讓女人的勞動生活遭遇種種限制，例如，對臺灣女性來說，她們的職業生涯常常選擇兼職或非正式的工作，為的是遷就婚姻與生育的需要；⁵又或者是，由於公共照顧、公共托育的匱乏，也促使許多職業女性「自願」退出職場成為全天候的母親。⁶

比較全球與本土資本主義歷史中的幾種「女性經驗」，我們很難不注意到，女人總是與包括了照顧、服侍、消費、審美等等的私領域活動密不可分。從勞動力的整體再生產過程來說，既然有了女人鎮守家庭，就能讓普遍的勞動力在私領域之內獲得照顧與復原，而這也是女人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對於剩餘價值萃取機制，所提供的最大貢獻。⁷

在本文中，我們就要從以上的觀點出發，來思考在當代臺灣小說中，女人與勞動、市場，還有階級社會等等制度面因素之間的緊張關係，並且在此基礎上，去思考所謂的「性別身分」與「階級認同」。在本文第二、第

³ David Harvey, 黃煜文譯,《巴黎, 現代性之都》(台北: 群學, 2007), 頁 200-203。

⁴ 1990 年代以來的臺灣女性勞動狀況, 可以參考張晉芬相隔二十年的兩篇文章。儘管整體而言, 女性勞動條件有所改善, 但是性別不平等的情形仍然相當顯著。張晉芬,〈綿綿此恨, 可有絕期?——女性工作困境剖析〉, 劉毓秀主編,《臺灣婦女處境白皮書: 1995 年》(台北: 時報文化, 1995), 頁 89-120; 張晉芬,〈性別勞動平權的進步與檢討〉, 陳瑤華主編,《臺灣婦女處境白皮書: 2014 年》(台北: 女書文化, 2014), 頁 171-201。

⁵ 尹慶春、簡文吟,〈已婚婦女的持續就業: 家庭制度與勞動市場的妥協〉,《臺灣社會學》第 1 期 (2001), 頁 149-182。

⁶ 唐文慧,〈為何職業婦女決定離職? 結構限制下的母職認同與實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85 期 (2011), 頁 201-265。

⁷ 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ed. Rayna R. Rei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p.163.

三節，我們要觀察職場與家庭中的父權意識形態，並且思考諸如「浪漫愛」、「家庭想像」，如何維繫了資本社會裡的階級區隔與性別分工；而在互相補充的第四、第五節中，則是透過細讀數部女性意識鮮明的小說文本，來思考自覺程度不一的性別主體們，其實是如何受到不同的階級位置、階級意識所修正。與此同時，本文也將反省臺灣女性小說中，多少忽略了庶民女性的聲音，而不自覺地偏好中產階級式的性別敘事。經過上面這些思索，我希望本文能夠聯繫臺灣小說中豐富的女性主題，以及較少被文學學者們討論的階級議程。

二、女性的勞動困境與浪漫愛情出路

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女人與男人乍看下在某種意義上是平等的：她們與他們都是待價而沽的勞動力。但是，當女人真正進入勞動市場，就得要面對男性不會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從屬與歧視，這包括了言語和身體的性騷擾、較低的新資、缺乏升遷機會的工作類型、性別隔離的環境、偏好男性的升遷評鑑制度等等。⁸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由於家務勞動的功能在於維護並再生產勞動力、而非直接產出剩餘價值，故而主要是由女性負擔的家務勞動，便根本地被資本主義系統排除於薪資勞動之外。⁹

早在日治時期，臺灣文學便已有不少關於女性勞動者的感人描寫，例如楊華〈女工悲曲〉，描寫了女工在寒冷清晨中趕赴工廠上班的場景；楊守愚〈誰害了她〉則說的是一位被農場監工欺壓最終尋死的女性。而在戰後臺灣文學史中，一個從資本主義勞動現場中反思女性處境的案例，便是陳映真的〈雲〉。這篇小說紀錄了在跨國企業體系中，底層女工們為了爭取同工同酬挺身而出的故事。小說中帶頭組建工會的何大姐曾經這樣講：「女工做的絕對不比別人少。但人家以為『查某团仔工』，只用來貼補家用，自己買衣服、買胭脂，看成粗賤的工，不值錢。我們女工也想，反正不是一輩子女工，不想、也不敢計較」¹⁰。與此同時，資方振振有詞地辯解，「女工的薪資，一般不必養家活口，是一個家庭的補充性收入。另一方面，女工們也認為到了及婚年齡，終需一嫁，結束工人生活，因此很少積極爭取較

⁸ Harold R. Kerbo, 《社會分層與不平等：歷史、比較、全球視角下的階級衝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 329-334。

⁹ Wally Seccombe, "The Housewife and Her Labour Under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83 (1974), pp. 1-22.

¹⁰ 陳映真，〈雲〉，《萬商帝君》（台北：人間出版社，1995），頁 73。

合理的工資」。¹¹顯然，因為企業主認為「女性必須回到家庭」，故而他們不相信也不期望，女人會長遠地留在職場上，故而衍伸出種種次級待遇。

但反過來說，如果女性真的按照這種期望，從職場「回到」家庭裡頭，那就是朱天心〈袋鼠族物語〉的主題。在某種意義上，這篇小說展示了描述了懷孕辭職、開始全心照顧家庭的「袋鼠」女性的生命經驗：「其實，在並不很久以前，她們亦是曾經一羣群以一雙美麗的進口鞋、東區服飾店買來的當季流行時裝、一次有設計費的燙髮、一家新開咖啡店的午茶、一本黨雜誌為貨幣計算單位的族群……你心愛的女孩，將來，順利的話，或許並不很久以後，也會成為袋鼠族的一員」。¹²

這一段引文能讓我們注意到，敘事者對話的對象，是對辭職顧家的女性伴侶處境無知無覺的中產階級男性。在小說的一開頭，提到這些「你」，在通勤時間總是不經意注意各種年紀女子，並在心底對之暗暗編織各種遐想綺夢，但是獨獨不會去注意不適宜交配的、正處於育兒時期的袋鼠族們。這些好色但是自動略去袋鼠的「你」，正處於「而立之年、在民國七十九年月收入四萬（以免落入低收入族群）、偶爾帶兒子去台大校園玩遙控飛機」。¹³〈袋鼠族物語〉當然是要描述家庭主婦的困境，但其真正提問的是：是什麼因素讓「女人」、「主婦」從整體中產階級裡面分化出來的呢？

事實上，即使是在技術與生產力處於較高階段的現代資本社會裡，每個一般性勞動力之所以能夠維持健康與穩定，其實，是因為「家庭」作為勞動者的生理照顧與心理支持，讓他們回到家後，能自操煩單調的機械勞動中暫時解脫，得到休憩與給養。然而，回家後躺在沙發上看新聞看報紙的男性勞動者，他們雖然享受家務勞動的「成果」，但卻不必給付家務勞動的等值報酬。在〈袋鼠族物語〉，袋鼠女子忙著打扮丈夫兒子而忘記自己的愛美習性、因為家務繁忙而無法繼續經營社交與友誼、或是育兒過程中瑣碎的溝通導致的語言能力喪失等等……這些都是為了讓家庭的正常運作，女性勞動力所付出的「代價」。

但是，女人的重荷絕不只是家庭中的各種勞務而已，更苛刻的恐怕是自我規訓的意識形態。正如社會學家 Beverley Skeggs 所言，勞工階級女性無時無刻不在培養自己的「天職」，訓練自己無私、友善、有耐心、將他人

¹¹ 陳映真，〈雲〉，頁 55。

¹² 朱天心，〈袋鼠族物語〉，《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麥田出版社，1992），頁 177。

¹³ 朱天心，〈袋鼠族物語〉，《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麥田出版社，1992），頁 182。

的需求擺在自身需求之前……並從種種奉獻行為中獲得某種道德優越感，以安慰並接受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從屬地位。¹⁴性別意識同樣鮮明的成英姝，在她的異色短篇〈我的幸福生活就要開始〉，就書寫了一個反面案例，一位不是那麼甘心成為「溫柔母親」的女人：琪琪突然在一位陌生男人的家中醒來，陌生人告訴琪琪，她出了意外，失去記憶，並自稱是她的丈夫，還抱來琪琪與「丈夫」生下的兩個長相醜陋的小孩。琪琪完全不能接受這樣的說詞，然而她因失去記憶無處可去，也只有將就在做水泥工糊口的「丈夫」那簡陋破爛的「家」中安頓下來。然而琪琪並不甘心，她不願負起家務的責任、也不願與丈夫同房，甚至打算變賣家產跟一位長髮英俊的鋼琴家一起到美國去，並要求丈夫無奈簽下離婚協議書。不料，就在琪琪的幸福生活就要開始的前夜，丈夫從鷹架上摔下，全身癱瘓——為難的琪琪在一番掙扎後最後放棄了「幸福生活」，決定負擔起照顧丈夫與女兒的責任。在該篇的續集〈公主徹夜未眠〉裡，透過女兒星星之口，我們得知了琪琪此後的母職生命：琪琪始終未曾「恢復記憶」，但還是滿懷怨對接受了失憶前的身分。她代替丈夫出外工作，扮演一個不稱職的母親、留在這個家中。

成英姝的這個兩個故事寓意是複雜的，一方面，自私又暴躁的琪琪，似乎不是「賢慧好女人」，難為讀者所同情，但另一方面，這反面形象似乎也反映了女性在家庭牢籠中的處境，不只是為丈夫奔波、為子女犧牲、還得打從心底去克制對母職的不耐與厭煩（顯然琪琪在這點上並不成功）。尤其是，當這個故事發生在工人階級家庭之內，更讓我們透過一位母職的失常者與反叛者，而看清楚在同樣階級之內的「性別剝削」：女性不只是被要求付出無酬的家務勞動，她同時還陷入內在的心理掙扎，要忠於自我？或是心甘情願為了家庭犧牲？在有形的勞務與無形的心理壓力下，我們大概很難苛責琪琪的「失職」。

然而，在我們這個父權社會中，「家庭」這個充滿性別壓迫功能的意識形態修辭，必然有其前置作業。尤其是現代社會，人們從傳統大家庭中解放出來，女性不需要再接受家父長指派的婚姻，於是，為了讓甫獲獨立的女人順利滑入「家庭」，繼續提供家事服務，就需要另一意識形態工具，也就是「浪漫愛」這種與婚姻密切相屬的情感教育，來讓女人可以心甘情願地回到家庭中去負擔母職、或是在婚前安居於過渡性的次級職位。¹⁵例如，

¹⁴ Beverley Skeggs, *Formations of Class and Gender: Becoming Respectable* (London: SAGE, 1997), pp. 68-71.

¹⁵ 例如在工業化初期的英國，《簡·愛》、《理性與感性》、*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

社會學家 Sallie Westwood 就指出，勞工階級女性在工廠生活中共享了關於家庭與戀愛的羅曼史文化，同時，這種性別化的文化最終使得她們樂意順服自身從屬的性別位置。¹⁶

因此，女性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困境，就不只是職場中的歧視與排除、或是被誣為天職的母職妻職。在更個人、更私密的層面，浪漫愛這種特殊的情感形式，常常躲在心靈之暗處，一方面，此種性別化的情感能夠作為女人進入婚姻、進入家庭的催化劑，另一方面，浪漫愛也讓女人渴望著王子的拯救，在我們這個沒有封建貴族的當代階級社會，所謂的「王子」，就只有坐擁榮華富貴的資本家或是管理階級來擔任。

這裡讓我們先來閱讀鄭清文的傑作，臺灣文學史上的名篇〈相思子花〉。這是一篇情調極為優美的故事，儘管故事敘事者是中產階級男性，但是，鄭清文卻提供了充滿洞察力與同理心的視角，向讀者展示了在資本主義臺灣的數十年歷史裡，農村女性難以避免的從屬位置、女性隨著經濟變遷而取得的有限獨立地位，當然還有性別與階級之間的，以「愛情」為名的某種遺憾與和解。

〈相思子花〉的故事如下：主人公「永祥」在中學畢業後，便離鄉背井、在都市從事金融業工作。四十年後（該篇描述的時間大概是 1940 中期到 1980 年代），退休回到家鄉的永祥，又重新見到了中學時暗戀的表嫂阿鳳。當時是日治晚期，永祥在上大學的前夕，曾經情不自禁地在撿柴的路上，輕輕撫觸了表哥未婚妻阿鳳的胸部，儘管阿鳳對永祥的示愛表現出害羞與沉默，然而，這段本來就難以見容於傳統道德的愛情，終究隨著永祥往台北念書、留在台北工作無疾而終。四十年後，早早便嫁作農婦、一輩子在田土勞動的阿鳳，終於與退休的永祥重逢，阿鳳說「要帶你去看一個地方」，這時六十多歲的兩人再度前往年輕時的故地，一條落滿相思子花葉的河岸邊。在那裏，阿鳳默默解開衣服，對永祥展露自己那被年歲刻劃的胸乳。最後阿鳳眼眶濕潤地說，當年做給永祥的魚簍，「既然沒有做好，以後也不想再做了」。

這類羅曼史小說（romance novels）受到大量女性讀者的歡迎，從而也奠定了資本主義社會下新的女性形象與家庭制度。可參考劉戈，《灰姑娘與灰公子模式成因探析：英國求婚小說和中國才子佳人小說比較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以及 Ian Watt，魯燕萍譯，《小說的興起》（台北：桂冠出版社，1984），頁 151-157。

¹⁶ Sallie Westwood, *All Day, Every Day: Factory and Family in the Making of Women's Liv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

儘管〈相思子花〉充滿老派的浪漫情調，不過，要是我們從階級政治的角度，閱讀故事裡的別離與重聚，那麼，就能在這首惆悵的田園牧歌中，觀察到臺灣社會的重大歷史變遷：這不只是一篇悼念愛情的作品，它其實也是一篇，以不曾發生的愛情為喻，來說明臺灣社會階級分化過程的文本。永祥與阿鳳的愛情，之所以被迫分離，那是因為在四十年前，臺灣社會開始從農村經濟邁向漫長的資本主義道路——阿鳳代表的是傳統農村、而踏入銀行界的永祥自然就是，會在未來取得成功的都市中產階級。要注意的是，對兩位彼此愛慕卻不能傾訴的年輕戀人來說，他們的障礙不只是大家族中的「傳統」倫理，¹⁷更無可克服的是，「現在與未來」中，資本主義即將擴大的城鄉差距。

在臺灣以農養工的經濟發展史當中，都市受薪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分化，其實來自國民政府的產業政策。為了讓青壯勞動力離開田園，政府施行了一系列壓抑農作價格、限制農業生產的措施，迫使農人無以為生、轉向新興的工業。這也讓農人的社經地位落入谷底。但是，資本主義有其難以捉摸的動態，在四十年後，〈相思子花〉的故事開篇，永祥回到的卻是一個不再貧困的農村，這並非是本土農業得到復甦，而是因為農人「土地雖然被徵收，減少了許多，地價卻不停高漲……在幾個月內，已變成比我這個工作將近四十年的薪水階級更富有了」。¹⁸永祥與阿鳳青澀戀愛的數十年分隔、還有農村與都市的巨大發展落差，居然如此諷刺地，只因為農村土地被捲入貪婪吞噬田園的地產資本主義，而再次「合而為一」。也許可以這麼說，在故事最後，阿鳳為了了卻心願，對永祥袒露乳房這一行為，那不只是憑弔四十年前無從萌發的戀愛，同時也代表了，由於經濟發展而分裂的兩個階級（鄉村農民與城市中產），在今日居然又被追逐房市泡沫、以建設為名炒作土地的「地產資本主義」而統合起來。¹⁹

但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是，在小說中，過往未曾實現之「愛情」的遲來回歸，雖然意味著農村與都市在資本高度發展下的再次接合，然

¹⁷ 小說中也有提及，隔壁村有位叫阿嬌的女孩子，因為不喜歡父母訂下的婚姻，還未成婚就跟別人跑走了。由此可見，束縛女人的傳統禮教在當時已經鬆動，真正阻隔阿鳳戀情的恐怕還是，永祥即將「成為都市中產階級」這一事實。

¹⁸ 鄭清文，〈相思子花〉，《相思子花》（台北：麥田出版社，1992），頁30。

¹⁹ 關於臺灣農村的土地問題，其成因相當複雜，但粗略言之，地方政府因財政困難，多藉由「區段徵收」手段，租售配餘地，以賺取利潤；而在私人資本方面，則是因為製造業獲利降低，因此私人企業也將資金轉往土地炒作。可參考許博任，〈浮濫圈地之成因及其抵抗〉，《臺灣人權學刊》第2卷第3期（2014），頁159-167。

而，這段歷史卻有性別化的意義。故事是這樣描述如今飽經歷鍊的阿鳳，「我還不知道她會開車，不過她開的四平八穩」、「她的手臂很粗，比我的還粗」，²⁰而且最重要的是，寡居已久的阿鳳，現在得以自主地面對愛情，是阿鳳主動帶永祥回到故地，並交代過去的情感。這裡我們要問的是，為何四十年後的阿鳳，終於有機會回應當年沒有絲毫可能性的戀情？答案其實還是要回到臺灣社會的經濟變遷。

且讓我們把〈相思子花〉裡的愛情主題重新解讀：對農婦阿鳳來說，之所以愛慕要去台北念大學、將要成為都市人的永祥，說不定是一種關乎階級的嚮往。如果農村中的傳統女性，多少理解到，自己在經濟位置和性別等級上的雙重從屬，那麼，她就只有透過愛情，與上位者結合，才有可能喘上一口氣。非常諷刺的是，以這篇故事來說，這份愛情居然在四十年分隔之後真的被「補償」了，而且補償的原因居然還是，早已蕭條的農村在資本主義的炒作下，成為金錢遊戲的新一波投資對象。不知道為了取回這一點點追求愛情的自由，年華老去的戀人們是不是付出了過於高昂的代價。

如果，「愛情」這種嚮往確實與克服階級地位的慾望相連，那麼，朱天文的〈帶我去吧，月光〉，則從另外一個面向，來展示那常常被女性主體所感覺到的，一堵充滿性別意味的「階級」高牆——儘管在這一故事中表現為，某種接近言情小說的天真戀愛的破滅，以及此破滅背後的，對於更高階級的憧憬。

故事主角佳瑋，是一個胸無大志、喜歡畫漫畫，任職於廣告公司的年輕女孩。儘管有著一位從學生時代起便相戀、幾乎論及婚嫁的男朋友，但是佳瑋仍不自禁地被廣告公司的香港大客戶，風流倜儻的夏杰甫所吸引。趁著陪伴母親回大陸探親的機會，佳瑋找了藉口停留在原本只是過境的香港，想要聯繫心中的白馬王子。然而，這位白馬王子其實是獵豔老手，他不過是希望在臺灣停留的短暫時光中，找個紅粉知己來場露水姻緣而已……

可以觀察到，故事中這位平凡的年輕女性，對於自己的「經濟地位」（尤其是在生活風格上）的不耐煩與厭倦。我們看到，佳瑋其實相當排斥自己那謹小慎微、克勤克儉的保守外省家庭，而高度認同都會布爾喬亞的跨國消費時尚。在故事後段，當母親硬拉佳瑋回大陸探親，一心想留在香港與夏杰甫幽會的佳瑋卻這麼想：「對母親那些誰誰誰，一海票沒有面孔的親友，既無興趣，也不想認識。南京上海，對她而言，永不及雜誌上看來

²⁰ 鄭清文，〈相思子花〉，《相思子花》（台北：麥田出版社，1992），頁11。

的東京，涉谷，代官山法國式刷白的蛋糕屋，青山路西武的無印良品店，以及遙遠希臘的蜜克諾絲島。」²¹

在這段引文中，我們能看到，跨國經理階級的夏杰甫，對於女主角的吸引，其實常常是與時尚雜誌上的異國情調混合在一起的，事實上，我們的確能看出，夏杰甫這位「JJ 王子」，他的魅力來源被重疊於某種消費主義的權威裡頭。佳瑋將自己對於這段跨國戀愛的幻想，寄託在她自己繪製的「JJ 王子」這一漫畫人物上，但是我們能注意到這位漫畫人物「JJ 王子」，其實是沒有面孔的，對照佳瑋對於夏杰甫的一無所知，我們可以說，「沒有面孔」是一條重要的線索，這表示了，女主角嚮往的很可能是一個（在自身所處的中產階級之上的）空白的階級位置，而不是一個真正的相知相許的情人。

要理解佳瑋的嚮往，我們也要觀察佳瑋的綺夢破滅的時刻，就可以略見端倪。當佳瑋與母親過境香港，佳瑋偷偷地打給夏杰甫的公司。然而從夏杰甫那專業、冷靜的聲調中，天真的年輕女孩突然明白，「在那蔚藍和水晶的菁英世界裡沒有她的位子，她掛斷了電話。」²²在故事最後，佳瑋的醒悟其實是一種對於自身的身分與地位的醒悟，她所嚮往的那種少女漫畫式的戀情，恐怕也是女性勞動者所無從實現的、對那些側身跨國資本階級之人的欣羨。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就可以這樣子去思考佳瑋對於男朋友李平的「精神外遇」背後的性別線索：遲遲不願與男友邁入婚姻的佳瑋，也許是至少在抗拒自己將要踏上的、位於「家庭中」的妻子的標準命運。正如父母親那平淡瑣碎的日常生活所揭示的，年輕的女兒一旦遵循正軌，嫁給男朋友李平，那也只不過重蹈母親的覆轍，成為一個對丈夫與子女無條件奉獻付出、沒有自我與私人空間的家務女工而已。不能忘記女性主義者對於古典馬克思的批判，我們必須認識到，不該把家庭看做「自然而然」的經濟共同體，家庭之內未必可視為「同樣的階級」，²³因為在家庭內部，仍存有經濟上的剝削關係。這個段落因此可以這樣解讀：佳瑋幻想出軌的深層原因，可能就是為了逃離，女性的性別位置和婚姻生活中對家務勞動的榨

²¹ 朱天文，〈帶我去吧，月光〉，《世紀末的華麗》（台北：遠流，1992），頁 112。

²² 朱天文，〈帶我去吧，月光〉，頁 121。

²³ 例如，社會學家 Goldthorpe 就認為，家庭成員不只是共享未來的生活機會、同時家庭也是階級結構下的基本行動單位，故而無論男性女性，個人的階級位置應該與家庭整體一致。可參考 Robert Erikson and John H. Goldthorpe,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32-233.

取。除了跨國資本體制與被羅曼史化的階級分層，〈帶我去吧，月光〉嘗試表白的另外一點就是，即使是現代都會女性，都難以逃離傳統性別關係的束縛，故而只有借助羅曼蒂克的月光、或說是白馬王子夏杰甫所代表的「上層階級」，來為都會女性打開一條潛意識的出口：如果能實現浪漫愛、並進入上層社會，也許就能從家務勞動中解脫出來。

三、被性別角色所侷限的階級意識

正如前面所說，在當代臺灣小說中，戀愛這種情感，反映了在階級與父權的社會中，同時被兩種不平等苦苦糾纏的女性處境。儘管浪漫愛足以引導女人「進入」婚姻與家庭，但也可以被用做女人的階級位置的一種精神出口，用以逃離母職、逃離女性角色、逃離家戶勞動。

在這一節，我們要再換個角度來看女性與階級的問題。如果浪漫愛這一感情形式形塑了性別氣質（例如「女性渴望戀愛」這一敘事），那麼，這種情感必然也折射了那種並非政治革命、但是卻渴望脫離低下階級位置的「階級意識」——這就是為什麼一些作品裡對愛情的嚮往，都可以被解讀為對於更高經濟地位的嚮往。然而，這一解讀其實還連繫到一個更嚴苛的問題：女性要怎麼樣認識到「屬於自己的」階級？這個問題對女人來說並不容易，因為，女人「自己的」階級利益，常常因為她們與父權家庭的那種半封建契約關係，而很難被當事者察覺。

作家林宜濤的〈鼓聲若響〉，就是一篇同時有著性別與階級雙重含意的魔幻寫實小說。故事裡，在脫衣舞團長大的鼓手「勤奮仔」，在一起尋仇事件中救了「蓋過五棟大樓，七十八間別墅的聯翔建設董事長高某某」²⁴，因此受邀至高老闆的豪宅作客。席間高老闆殷勤勸酒、拍著胸膛與「勤奮仔」稱兄道弟，最後「勤奮仔」不勝酒力沉沉睡去。沒料到，當「勤奮仔」半夜醒來，卻撞見了高老闆與女友香香正在大行好事：「他在廚房裡看到一對狂歡的男女。董事長高某某這時候像隻狗那樣跨騎在撩起裙子彎腰趴在流理台的香香身上……而高某瘦削見骨的手掌裡，抓住一疊花綠鈔票，然後那些鈔票像繽紛的花朵被拋向天空」²⁵。這故事的結尾，帶有超現實色彩，「勤奮仔」僅僅憑著胸中的怒火，發出一聲原子彈爆炸般的「幹——伊——娘——」怒吼，就炸毀豪宅、埋住了背叛勤奮仔的狗男女。敘事

²⁴ 林宜濤，〈鼓聲若響〉，《人人愛讀喜劇》（台北：遠流出版社，1990），頁189。

²⁵ 林宜濤，〈鼓聲若響〉，頁192。

者如此評論：「這裡頭是否如阿丁所說的象徵了資本主義的罪惡和社會主義的理想，我就不得而知了」²⁶。

乍看之下，〈鼓聲若響〉說的是現代社會中資本家對無產者的剝削，以及由之引爆的階級衝突。但是，深入思考這樣的故事，裏頭不只是地產大亨對於底層男性的侵凌，「女人」更被視為階級矛盾的焦點。儘管〈鼓聲若響〉顯然政治正確地站在無產階級那邊，²⁷然而，這故事中的性別關係似乎又不太對勁，女人在階級戰爭中是被爭奪的客體，而不是發起鬥爭的主體。在故事中，勤奮子女友選擇其他男人，這應該被懲罰嗎（即使這個男人是她的階級敵人）（香香是個風塵女郎，同樣也是無產者）？又或者是，選擇一個男人之後，「女性」的利益就附屬於該男人的階級利益？這裡大概是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那著名的「不快樂婚姻」²⁸。儘管同為左派進步思想，但是階級與性別兩種視角卻存在一種內在的張力：被資本體制所支配的男性工人，常常免費地支配在家庭中的女性。

而原住民作家里慕伊·阿紀（Rimui Aki）的長篇《懷鄉》，則提供了一個同時被族群位置與性別地位所侷限的階級視角。《懷鄉》說的是國二時未婚懷孕，嫁入窮困後山部落的泰雅族女性懷湘的一生。在小說中，缺乏學力與專業技能的懷湘，兩次婚姻失敗、獨力撫養四個子女，大半輩子都在都市的邊緣浮浮沉沉。即使如此，在中年以後，懷湘給自己的答案卻是「回到部落去」，她相信在「家」與「故鄉」中，總能找到一條出路。相似的，在懷湘早年，為了在精神上逃離嚴酷又貧窮的婚後生活，當她生下大女兒後，便依照自己愛看的瓊瑤言情小說，將女兒取名為「夢涵」。這樣的名字採用了大眾文學裡的陰性中國想像，來寬解懷湘自身的經濟地位。從階級意識的角度，此一作法非常耐人尋味，因其反映出這故事裡一直存在的，某種性別化的「不充分階級意識」。懷湘總是採用了一種「女性化的情感」（將希望寄託在家庭中、或是在一個夢幻浪漫的名字中尋找慰藉）來面

²⁶ 林宜濤，〈鼓聲若響〉，頁 178。

²⁷ 不過，也必須體諒，為何工人的階級團結常常採取一種男性氣概的、父權的形式呢？何明修對於臺灣工運中的男子氣概的研究，就很值得參考：「在缺乏其他更有利的論述下，工人只得轉向更原始的、素樸的文化資源，來建構他們的階級團結與參與動機」。何明修，〈臺灣工會運動中的男子氣概〉，臺灣女性學學會、張盈瑩、吳嘉麗編，《陽剛氣質：國外論述與臺灣經驗》（高雄：巨流，2012），頁 356。

²⁸ Heidi Hartma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in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London: Pluto. 1981).

對自身低下的階級處境。值得追問的地方正在於，為什麼社會底層女性沒有在真正困住她們的「階級處境」中尋找出路，而是在逆境裡「更為女性化」？在下面兩節，我們將要更深入《懷鄉》所帶出的上述問題，但在這裡，主要是在於提醒：貧窮女性的階級觀點，常常是更「性別化的」。

因此，如果說〈鼓聲若響〉、《懷湘》這類看似在階級立場上「保守」的文本，若是能夠給我們甚麼樣的啟示，那也許就是，階級這一範疇，必然要受到性別的修正。從本文關注的兩條主軸來說，我們可以這樣延伸，即使階級地位上利害一致，但是，男人與女人之間，仍存在著最根本的不平等。在朱天心的〈新黨十九日〉，我們就能對於上述這種交織著多重身分的社會過程，稍微做出探究。在接下來對於該篇的分析中，我們雖然能看到女性主體在階級議題上「解放」、「覺醒」的契機，然而，解放跟覺醒通向的卻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層矛盾。「被啟蒙的女性主體」很快地會發現她的政治意識，恐怕與她的經濟地位、社會性別之間，存在嚴重的斷裂。

〈新黨十九日〉描述了一位生活封閉的家庭主婦「她」，因為偶然接觸股票而在股市投資上小有斬獲、又因為開始閱讀財經雜誌與國際新聞，而慢慢理解了過去在廚房客廳中無法得知的「家庭外面的世界」。當政府宣布開徵證所稅時，「她」加入發起抗議的萬千股民，第一次上了街頭，並「終於」得知了國民黨世界觀之外的種種衝突如「民進黨」、「農民運動」、「彭明敏」等等政治反對力量的存在。然而，當證所稅確定停徵、在街頭遊行不去的「股民黨」一哄而散後，「她」才發現，原來在十九日的街頭生涯中，自己那「缺乏經濟基礎」（不屬於自己階級的階級意識）、在十九日抗議期間培養起來的正義感與社會關懷，居然有多麼難以為繼。小說的尾聲，只留下自己在警察驅離時倉皇逃命、卻被新聞雜誌所拍下的一張，使「她」無地自容的照片：「照片旁邊有一行說明文字：『逃命要緊，支持什麼黨以後再說』」。²⁹這個故事也許用馬克斯的詞彙來轉述會更加畫龍點睛：〈新黨十九日〉是從中產階級的角度，來談一種個人化的「政治經濟學」之所以不可能。或者說，主角身為原本只與私領域的家庭有密切聯繫的性別化個體，她慢慢地從純粹的經濟動機之中，發展出某種通向公民社會的政治學與道德觀——不幸的是，她同時也嘗到了，自己那與自身階級及性別位置脫離的政治觀點，終究還是無法見容於結構，通篇是一場悲傷鬧劇。

²⁹ 朱天心，〈新黨十九日〉，《八十七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1990），頁 67。

仔細閱讀這個故事，我們能看到，一開始的時候，「她」原本幾乎完全不懂國家大事，同時也非常甘於柴米油鹽的生活，為家庭無條件付出。過去她在每次選舉的投票行為都只是遵從個性強勢的外省籍丈夫定吾的指示：「定吾沒叮的時候她都忘了投，定吾叮的時候只好一起去並聽從定吾指點投下與定吾一致的選票」。³⁰

然而，當「她」「禁不起表姊的遊說，把一筆她根本不想標下但被抽籤分配到的到期會款隨表姊去買了些股票」³¹之後，便似乎開啟了啟蒙的可能性。因為股票的緣故，「她」的關心由此從家務勞動中溜走，並且慢慢試著去「理解世界」。由此她展開了屬於股民的「政治經濟學」，或者更精準的說，從經濟動機裡面發展出來的政治學。這一政治同時改變主角對於世界的知識，在思想層面，「她」開始閱讀報紙收聽廣播，關心美國中西部農業的旱荒，或是張榮發在全球航運的分量；而在物質的層面，原本沒有收入的「她」，開始享受用自己的錢買奢侈品給丈夫兒女的那種闊綽（雖然丈夫根本沒發現妻子買給自己的衣物都是百貨公司名牌），或者是因為能夠任憑己意支配金錢而隨之發生的自信。

然而證所稅的開徵，逼使「她」從上面的那種保守的政治位置中走了出來。「她」跟隨憤怒的股民們上了街頭：有了社運初體驗、第一次拿起民進黨的旗幟、第一次在心裡思考遠化罷工和五二〇農民遊行對臺灣社會的意義、第一次閱讀彭明敏所寫的倡議自由民主的書籍。在這場為期十九日的股民抗議中，〈新黨十九日〉精闢地展現了中產階級的啟蒙——那是一個在性別上邊緣但在經濟與族群上優勢的角度，去觀察「中產階級」可能有的，如果不是階級意識的話，最少也是「參與集體行動的渴望」。

小說中的「她」一直想要強調自己「無關乎職業，她與她們是絕對不一樣的」³²——不但區隔於那些撒嬌似地去請問股市名牌的年輕玩票女上班族、也區隔於在這場股民街頭抗爭中其他那些單純只是為了保衛階級利益的、唯利是圖的、上至大量持股民意代表，下至閒來無事每天逛號子的富家太太們。「她」的內心吶喊著：自己確實是有某種理想性的！「她」渴望為了社會弱勢付出或奉獻！這也是為什麼「她」願意在十九日間，不間斷地瞞著家人去聲援，甚至一直堅持到確定證所稅緩徵後，所有街頭抗議的股民飛快樹倒猢猻散為止。換句話說，「她」認為自己「好想去搖那隻自己

³⁰ 朱天心，〈新黨十九日〉，頁 53。

³¹ 朱天心，〈新黨十九日〉，頁 51。

³² 朱天心，〈新黨十九日〉，頁 56。

選擇的旗子，跟一群比咪咪毛毛定吾要與她熟悉多了的陌生人齊心喊口號，喊好大聲」。³³

儘管如此，〈新黨十九日〉尤為精采的地方是，不可全然信任小說主角對內在的突發政治情感之轉述。重點在於，「她」在街頭上被激發的那種，同情農民、工人、環保運動的政治意識其實是：儘管主角多少理解到政治問題最後仍是經濟問題，然而，她卻沒有真正地認清自己的經濟位置與階級利益。這也是為什麼被主角錯誤地引為同志的「十九日新黨」們（由「上街頭的股民」所組成的「新黨」），說穿了，本質上不會是一個完整的、有政治覺悟的社群或是集體。因為這個新黨的成員，無論省籍、無論性別，但只有當某種市場所創造出來的榮景偶然與國家政策抵觸的時候，這些人才願意為了捍衛自己的利益而短暫地組織起來。很根本的來說，這還是某種與大資本相連屬的利益。

考慮到主角處身的實際政治條件，例如說（在性別上）身為家庭主婦、（在經濟階層上）習於用股票賺的錢購買奢侈品的那種生活——這些都又限制了「她」能夠真正成為某種更加激進的左派。雖然天真的女主角並不自知，但是做為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主婦，她卻出於偶然地培育了錯誤的、與自身斷裂的、類似階級意識的政治激情。〈新黨十九日〉充滿同情地展示了這個「性別化的階級意識」，在故事結尾，「她」在街頭狼狽奔逃的照片，被餐桌上一起吃晚飯的家人們在報紙上看見，「她」放聲大哭，一時之間只感覺到與丈夫兒女都極為陌生。對此我們能夠這樣解釋：作為「妻子」、「母親」並且付出家務勞動、與外在世界隔絕的「她」，在這時候，很明顯地從中產階級的整體利益中抽離出來，儘管，「她」與享受主婦的家務勞動的家人們共組一個家庭，但是「她」的家人們並不真正理解、也不真正與「她」站在一起。這裡非常明顯的就是，「女人的階級意識」正如馬克斯所言，根本性地由經濟結構所決定：當她只不過是家戶中的無酬勞動力時、當她因為擁有中產階級教育條件從而有潛力去「理解階級社會」時、當她附屬的家庭出於自身階級位置而不可能同情政治運動的反對者時，這些與「階級意識」互相衝突的性別與經濟形構，就要讓女人感受到最沉重的碰壁。她那滿腔對於社會平等的熱情，註定是不可向家人公開的愚蠢秘密（換句話說，「她」不能在父權家庭內部表達新獲取的階級意識）。

³³ 朱天心，〈新黨十九日〉，頁 54。

四、兩部「女性」小說中的階級鴻溝

在上一節這些性別體制與階級結構犬牙交錯的小說文本裡，可以說「女人」無可避免面臨了自我認識的問題：在特定社會條件的制約下，要怎麼「理解」或「察覺」性別化的階級利益？〈新黨十九日〉裡的「我」，顯然沒辦法在政治上「出櫃」，並且因為政治啟蒙與親愛的老公孩子發生疏離。而《懷鄉》中的泰雅族女孩懷湘，當她帶著慈愛為女兒命名的時候、當她在基隆當酒女與媽媽桑的時候，她都是「女性的」而不是「階級的」主體，懷湘真誠地扮演性別體制下的女人角色，而對勞動者身分沒有自覺。要是我們前面所討論的通俗「浪漫愛」情感，同樣能看到，浪漫愛的萌發其實關聯到女性主體對於自身階級位置的體悟，資本化、階級化的現代臺灣社會阻絕了〈相思子花〉阿鳳的青澀戀愛；而〈帶我去吧，月光〉中的跨國戀情，則是一位情感與意識都被全球資本主義所深深滲透的平凡女孩的（存在於言情小說想像的）救贖。即使是浪漫愛情這一女性化的情感，基本上也是一種表達階級位置的工具。

於是，我們便能回到一個與「文學」本身息息相關的問題：女人要怎麼「表達」自己的階級位置？當她被發現她赤裸裸地被貶為第二性的時候、當她被家庭剝削的時候、當她感到浪漫愛是自身次級階級位置的可疑出口的時候、當她醒悟自己的階級利益與男性工人不相一致的時候，還有對我們這篇論文的主題來說最重要的：女人要怎麼樣在保持性別自覺的情形下，來指涉自身的經濟位階（或是反之亦然）？為了觀察性別意識如何被其階級處境所決定，我們將要在兩篇臺灣女性小說中，找出「階級化的性別」——換句話說，我們要考察女性這個身分，是如何被階級分野所改變。

在此我打算比較兩部作品中的女性經驗，來思考以上的問題。一是前面已經稍微提到的，筆法雖樸實但意涵豐富的《懷鄉》（以及同作者的原型短篇〈懷湘〉）。另一篇是老牌現代主義名家郭松棻的〈月暈〉。這兩篇「女性小說」（假如不訴諸作者真實肉體狀況而觀察它們的敘事策略的話）分別指向兩種「失語的女性」，但是，她們展現「無聲」的方式，又關聯到各自不同的階級位置。如果說，〈月暈〉中女人的沉默是對於婚姻與家庭的不能苟同，³⁴那麼，《懷鄉》中的寂靜卻更接近一種柔順，因為「部落」、「母

³⁴ 「〈月暈〉是一篇女性小說……描寫的是現代家庭的毀滅」。董維良，〈小說初讀九則〉，陳萬益編，《郭松棻集》（台北：前衛，1993），頁556。

職」終究是底層原住民女人的生命困頓之解答。我們看到，懷湘最後回到部落，全心教養么女小竹，以彌補因為前往都市工作而無法好好將前三個子女帶大的遺憾（故事中，懷湘的前三個子女，都陷入都市邊緣的原住民困境，打零工維生或沉湎於酒精）。《懷鄉》結束在女兒小竹考上長榮空姐、並帶母親出國遊玩的那一刻，這時，終於有所慰藉的懷湘，才覺得自己生命「圓滿」了。然而，母職作為女性敘事的終點，會不會意味著女性的聲音沒有從父權宰制中真正逃逸？

而儘管〈月嚶〉與《懷鄉》同樣都是要描寫在臺灣的不同現代化階段，受困於傳統性別角色的女性，但是，諷刺的是，即使《懷鄉》的年代比〈月嚶〉還要晚了二十年以上，底層的泰雅族少女一直到老都深深被傳統制約，而漢人資本家之女則能夠從父權婚姻中覺醒。〈月嚶〉故事是用倒敘開始，膝下無兒女的女主角「她」，在丈夫死後，遲疑著不願安排下葬事宜，她每日步行至殯儀館，盯著冰櫃裡丈夫的僵白面孔默坐終日。殯儀館人員誤以為這是「她」對丈夫的「深情」，並且喟歎道：「噢，夫人是怎樣地悲慟啊」，然而真相全然不是這麼一回事。無言的「她」，事實上是在對自己身為人婦的這一輩子，進行深刻地反省。隨著女主角在棺前的回憶，讀者看到，太平洋戰爭的烽火下兩人初識、開始時還有些不情願的婚姻、經歷急症生死關頭而開始萌芽的夫妻感情、中年後當大學講師的丈夫才有機會去日本留學、歸來後倆人終於有白頭偕老的默契……伴隨著臺灣社會變遷歷史，這對夫妻平日相處的一景一物，在意識流文體中銳利呈現。然而，最後，這一善於自剖的女性自白，抵達了丈夫過世後的數日之前——我們這才發現，原來「她」一直到了人生遲暮之時，才終於察覺了，原以為的老實丈夫，居然在日本另有情婦。而女主角在棺前的凝睇，那可不是與子偕老的深厚愛情，而是朝向死去的丈夫、也是對於這場婚姻中被精心隱藏的種種背叛，發出深刻的質問。

〈月嚶〉中女主角的際遇與困境相當「現代」，包括了她在殖民政權下就受過高校教育、在太平洋戰爭時的擇偶問題、在核心家庭裡因為不孕帶來的煩惱、對待丈夫的心態在戀人與母愛之間搖擺、以及沒有進入婚姻的可能情慾對象（少女時撞見的那個蒼白病弱的青年），這篇短篇其實觸及了都市中產階級的各種女性議題，「女人」似乎不一定要成為生育機器或是婚姻娼妓，還有其他道路可以展望。在〈月嚶〉裡，「她」發現的不只是丈夫的不忠，同時也發現了，在婚姻之前與之外，自己作為性別體制內的存在，還有其他的可能（未婚時也可能喜歡上其他人、結婚以來並沒有對丈夫真正死心塌地）——而郭松棻由現代主義鍛鍊出來的摹寫技巧，在這裡作

為「她」觀察婚姻與愛情的角度，尤其更是讓小說中的「女性」身分顯得洗鍊犀利。

然而，同樣是女人的故事，在《懷鄉》之中則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故事裡的父權婚姻，看來並不能使得重疊了原住民身分與經濟弱勢的女性主體擁有甚至是低度的「對性別體制的自覺」。國中都沒畢業的懷湘，她憧憬愛情、對父親又敬又畏、對婚姻困境極為「堅忍不拔」，簡直「賢淑」的不得了。在該故事的原型短篇〈懷湘〉結尾，懷湘與丈夫馬瀨一起躺在初戀時兩人幽會的地點，故事的敘述聲音說明了懷湘的性感受：「聽著馬瀨喘息的声音，懷湘腦海中浮現起『秘密基地』的甜蜜往事。結婚第七年……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滿足』」³⁵。即使承受丈夫的陽剛粗魯，³⁶以及壓制性的父系家庭結構，但是在該短篇最後，懷湘卻回到了她與丈夫「愛情」之起點，並且在那裡得到了她睽違已久的身體滿足。而在改寫後的長篇《懷鄉》，好像也沒有「進步」多少，正如上面所言，懷湘下半生在克盡母職後，得到了心靈的平靜。

即使〈懷鄉〉與〈月嚶〉都聚焦女性的從屬位置，但是，它們卻有很大的差異：現代主義的〈月嚶〉講的是，「女性」邁入「現代」（不管是外在的臺灣歷史或內在的性別意識）、開始自主獨立、獲得啟蒙的那一瞬間，因此，「女性」發人深省的沉默是為了批判賢妻良母這樣的性別角色。相較之下，採用樸素敘述腔調、連控訴社會不公的寫實主義激情都缺乏的《懷鄉》，主人公雖然沒有權力，卻並未吝於「說話」，問題毋寧在於，即使帶有女性觀點的讀者聽得見懷湘個人的心聲，但卻無法從女性主角的意識之中直接找到「整體女人」的觀點。換句話說，在《懷鄉》中失語的不是飽受苦難的懷湘，而是女人這一範疇。〈月嚶〉則相反，即使「她」不發言，但該篇所選擇的知識階層讀者卻很快就能進入性別反思當中（〈月嚶〉並不算好讀，尤其與文字平順的《懷鄉》相比）。並不意外的，筆法冷靜安詳的

³⁵ 里慕伊·阿紀 (Rimuy Aki)，〈懷湘〉，孫大川編，《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 小說卷》(台北：印刻出版社，2003)，頁166。

³⁶ 在長篇《懷鄉》中，兩人在婚後數年，決定從後山搬往平地，尋求經濟上的改善。但是馬瀨三天兩頭就換工作，每次失業後都拿妻小出氣，動輒辱罵毆打。像馬瀨這樣的「壞丈夫」現象其實不只是「性別的」，同時也是「種族的」。必須考慮到，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弱勢族裔很可能因為或隱或顯的種族歧視，導致其就業上失利，從而很容易陷入憂鬱或憤怒當中（婚姻暴力自然是這種情緒的副產品）。此外，對弱勢族裔男性而言，失業讓他們無法負擔家計，更加挫折了他們的男性氣概，可參考 Avtar Brah, "Unemployment and Racism: Asian Young on the Dole," in *The Experience of Unemployment*, ed. Sheila Allen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6), p.67-69.

《懷鄉》，在小說最後，同時向「(原住民)傳統」與「母職」達成了某種不完全的復歸。儘管如此，我反而認為，正因為《懷鄉》著意描寫了這位「缺少性別自覺的傳統女性」，才使其成為近年少見的佳構，甚至該篇還有一處是現代主義傑作〈月暎〉所不及之處：比起「性別意識」鮮明的多數女性小說，很少在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裡被捕捉的「底層」女性主體，也許就在《懷鄉》的故事中生動地被描述出來——以一種自然化的、缺乏性別反思的樣式出現。

對於女性之文學形象的問題，後殖民理論家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思索將會給我們很多啟發。按照史碧娃克，左派知識分子慣於想像一種「可以清楚認知自己、為自己發言」的被壓迫者，同時，他們又把知識分子的角色視為透明的、僅僅是忠實傳達這些被壓迫者的利益與意志。³⁷因此，在印度傳統風俗 sati 中，隨過世丈夫自焚殉身的寡婦，就是這樣一個「被報導的客體」：印度民族主義者相信自焚寡婦是復興傳統的文化英雄、但對英國殖民政權來說，sati 則是落後殘忍的陋習，需要關心女性權益的現代性治理對之詳加監控。³⁸於是，在權力最末端的婦女，她們無從發言，只能任憑不同掌權者將「聲音」加諸其上、同時被「本土民族主義」與「殖民治理」偏頗地詮釋。

如果將史碧娃克的質疑延伸到「女性文學」這一範疇之內，那麼，是不是也可以這麼想：有時候女性主義對於父權的「批判」，會不會有點是善意的霸道，反而使得知識份子視野無法去容納，例如在《懷鄉》裡面，那種過於平凡、無法離開「傳統性別觀念」的「缺乏反思的女人」？³⁹在此，我們應當稍微在當代臺灣文學史之脈絡中思考，多數的文學史研究，所強調的都是，1980 年代以後，蓬勃發展的女性文類以及女性作家如何有意識地去消解或重寫父權文本。⁴⁰如果仔細思考以上那廣被接受的解讀方式，就能理解

³⁷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張君玫譯,《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台北：群學，2006)，頁 302。

³⁸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張君玫譯,《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頁 267-283。

³⁹ 由於批評家們大多偏好「進步的」閱讀策略，因此，甚至是蕭麗紅〈桂花巷〉、《千江有水千江月》這樣保守的女性文本，有時也被解讀為「顛覆父權」。例如楊翠，〈文化中國，地理臺灣〉，《臺灣文學學報》第 7 期（2005），頁 247-275、邱貴芬，〈女性的「鄉土想像」：臺灣當代鄉土女性小說初探〉，《仲介臺灣·女人》（台北：元尊文化，1997），頁 74-103。

⁴⁰ 關於當代女性小說研究中的這種「政治正確」之「共識」，可參考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下）》（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范銘如，《眾裡尋她：臺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2003）；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論解嚴以來的臺

到，文學學者們顯然更為關注的是「反抗壓迫的積極女性主體」，而不是那些很可能在現實生活中依舊占多數的「接受並內化父權體制的普通女性」。

當然，並不只是學者與批評家如此，在進步的性別觀點下，女性文學形勢大好，多數關注性別問題的當代臺灣小說，往往強調的是「反抗父權」、「女性意識」。不管是〈自己的天空〉、〈世紀末的華麗〉、〈沉默之島〉、〈尼羅河女兒〉等等聚焦都會女性的篇章，或是《殺夫》、《惡魔的女兒》、《油麻菜籽》、《桑青與桃紅》這類更關注鄉土、底層、民間的女性身份的作品，其實都是「理想的女人」，要嘛是敢愛敢恨的獨立女性、要嘛是激進女性主義的瘋婦抵抗。

然而，從反面思考，上述性別書寫策略會不會「太過於」強調「女性主義」的批判位置，因而忽略了性別意識的具體構成，也必然會因為個別女性的族群與經濟等其他社會位置而受到程度不一的侷限？有趣的是，在臺灣女性小說傳統中，底層女性的缺席方式是很微妙的，儘管小說家與批評家通常並不吝於描寫較低階層的女性角色，但是，這些被著意描寫的「底層女性」，卻通常擁有中產階級女性的心智、勇氣與反思能力，從而敏銳地質疑男權社會。也許可以這樣說：平凡女人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 往往缺席，但是她們的「性別標籤」卻總是鮮明在場。當臺灣女性小說在試圖描寫社會底層女人的時候，其敘事的聲音，或者說，女性書寫的階級位置，都仍然是強烈的知識份子本位。這些充滿野心的作品常常忽略的是，從「被壓迫女性」自身的角度，來展現她們的世界觀與價值，這也該是文學作品的首要任務之一。

五、在文學史中失聲的底層女性

延續上一節所提到的，雖然「女性文學」在當代臺灣文學史中佔有不只一席之地，但是這些性別意識昂揚的野心之作，其長處也正是短處：女人總是能夠與她們生長其中的父權宰制結構拉開足夠的距離。就單一個案來看，這類文學傑作當然不會是問題，然而，問題卻是整個文學史層面的，因為，有這麼多「在政治上」立意要為了普遍女性發聲的作品，但是它們「在美學上」卻總是飽含較高社經地位才得以藉由文化資本所獲致的那種憤怒與敏感。換句話說，女性主義政治立場是一回事，但是僅就小說這一理應存在一定程度民族誌性格的文體而言，假使「深描(thick description)」、「情境化

(contextualization)」這些文化詮釋的基本人類學概念還有其要緊之處的話，那麼，在一定程度上，嘗試進入「無從看穿父權」的女性生命經驗是不是有其必要？畢竟，小說文類不只是政治宣言而已，它應該也要有觸碰、逼近它的描寫對象的企圖才對。我們還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正如范銘如的提問，為何女性不寫鄉土？或者稍微延伸，為何關心女性問題的小說文本，反而不太去寫那些「沒有性別自覺的女人」。在六〇年代以後的臺灣女性書寫，似乎大多屬於中產階級的性別經驗，這似乎顯示了「女人」的發言權幾乎被「都市裡的女人」給壟斷。⁴¹

正如史碧娃克對殖民歷史檔案的反省，知識分子常常是加劇「從屬者 (subaltern) 無法發言」的共犯，⁴²當我們假設底層女性需要被拯救、被解放的時候，知識份子就會著急於代替弱勢者表達、「為她們說出」她們承受的委屈與壓迫。「知識分子」的一個老毛病就是，總是期望更「深刻」、「根本」的東西，假若她們讀不出政治上的弦外之音時，平凡女人的聲音就容易被當作無關緊要瑣碎事務而不必慎重考慮。長篇小說《懷鄉》的原型短篇〈懷湘〉，原本是 2001 年第二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小說組第三名作品，在性別議題上非常老練的作家廖輝英，在評審會議中就「注意」到該篇的「非政治」性格。她如此評論〈懷湘〉：「沒有太大的野心或格局，以平實的寫實方式……紀錄女主人翁的生活」。⁴³「沒有野心」很有可能是這篇傑出的短篇小說屈居第三名的原因之一，正如我們前面所講，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閱讀〈懷湘〉，乍看下會是有點保守的，其在字面上、情節上，皆不涉及任何程度的「抵抗」。而當 2014 年里慕伊·阿紀終於完成長篇《懷鄉》時，書市反應既不熱烈，也少有文學雜誌的評介。而在 2015 年文訊雜誌社所舉辦的「廿一世紀華文長篇小說 20 部」活動中，這本優秀的女性小說，甚至不被列入票選名單（此名單包括了 2001 至 2015 年間所出版的一百多本長篇小說）。

另一次則是我自己的切身經驗。在某場研討會的空檔，我與一位優秀的青年小說家聊天。相較於我對該小說的高度喜愛，這位小說家則是告訴我，她覺得《懷鄉》「寫作技巧太平淡、政治意識太保守」，接著當我們列舉彼此欣賞的女性作家時，她則是提到了郭松棻：「比起生理女人，郭更能觸及女性意識幽微之處」。雖然口語上說「女性意識」並沒有被明確定義，

⁴¹ 范銘如，〈女性為什麼不寫鄉土〉，《臺灣文學學報》第 23 期（2013），頁 1-28。

⁴²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張君攻譯，《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頁 349-350。

⁴³ 孫大川，〈編序：臺灣原住民文學創世紀〉，孫大川編，《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 小說卷》，頁 126。

但我們可以理解，她指的應該是在郭松棻作品中，尤其細膩婉約的情感觸覺以及刻意邊緣的社會視角。這樣的評價並非過譽，然而，卻也帶出了本文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現代主義美學、以及習慣現代主義的菁英讀者，他們所設想的「女人」，是否聯繫於特定階級與該階級的文化實踐？

兩位成名的小說家同行，分別在公開與私下，對於《懷鄉》提出「不夠深刻、太過平淡」的相似看法，這顯然並非巧合。上述典型的評價方式，也許很能幫助我們認識到，「再現女性」這一深刻的文學志業，確實蘊含著由廖輝英所說的「野心、格局」所包容的更崇高的東西——對女性生命經驗的政治化詮釋。由於故事裡的「懷湘」是一位缺乏理論認識與批判思考的傳統女性，因此，對於召喚文學家的「女性知識份子視域」來說，《懷鄉》的書寫就被視為中規中矩、平平無奇的。

現在可以重新比較我們臺灣文學語境中的「女性」小說敘事了，如果沿著前面的思路追問：為什麼呈現一個「深刻」的女人要比一個「平板」的女人更被文學志業讚賞呢？為什麼非政治的《懷鄉》被遲疑地評價，但例如前段提到的這位青年小說家，卻如此欽服於郭松棻透過爐火純青現代主義技巧所揭示的「女人」？為了解答這個問題，也許我們可以追索小說中的「女性聲音」，來思考「女性」的階級位置，究竟是如何地透過不同「發言方式」而被呈現出來。

在《懷鄉》和〈懷湘〉，以不同文字體系呈現的「族語的聲音」，頻繁地出現小說之中，比如以那（媳婦）、亞大（阿姨或嬸嬸）、Mknaziy（部族名）、phagun（犧牲禮）等等。為什麼原住民女性小說需要召喚族語？因為，母語是現代化較慢的底層女性的聲音內部，無法分割的文化印記。在運用殖民者語言（北京話或中文或華文）「表述」原住民女性生命經驗的同時，母語無法完全被替代，原住民女性的社經地位，讓她們「現代化」的更慢，這種遲滯的現代化經歷就反映在其口語聲音的混濁交雜之特徵上頭。

此外，小說中，在懷湘與馬瀨的婚禮上，來幫忙的伯母叔母等女性長輩，自然而然地用日語交談——因為整體泰雅族人沒有社會資源去更新第二任統治者帶來的現役「國語」、而中老年女性則更是封閉在部落與家庭中，沒有機會踏入平地漢人社會，故而顯現在語言中的前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殘餘，就成了她們的族群與女性身分的重要標記。故事中更顯得尖銳的就會是，婚禮不久之後，年輕的懷湘居然選用言情小說裡的中國文化符碼，來給初生嬰兒命名。⁴⁴這麼做的原因無他，因為第二任統治者帶來的官方語

⁴⁴ 里慕伊·阿紀 (Rimuy Aki), 〈懷湘〉, 頁 159、里慕伊·阿紀 (Rimuy Aki),

言，已經深深埋入了懷湘這一代族人的思維之中。身為一個泰雅族少女，懷鄉滿懷憧憬地從瓊瑤小說那裏選取一個中國風的「很夢幻的名字」，並且交與自己親愛的女兒，這裡暗示了，原住民身分下的「女性」生命，很容易被陽剛父權國家機器烙印下溫馴的女性形象。有些相似的，里慕伊·阿紀另一〈小公主〉，也出現相似的矛盾，從小遠離泰雅族人、與離婚的母親居住在大城市的「小公主」田恬，在結尾處哭著傾訴，聲明她最想要的是一個，父母俱在的「溫暖家庭」。⁴⁵里慕伊·阿紀的這幾篇小說，最耐人尋味的地方就在於，不管是「田恬」或「懷湘」，這些平凡女性的切身情感都渴望著民族國家、家庭、羅曼史愛情這些被女性主義者深深懷疑的父權構造物。換句話說，父權體制對庶民女性生命史，恐怕舉足輕重，也許在所謂「庶民女人的聲音」內部，女人之所以能成為女人，原本就會有一些真誠卻反動的意識形態雜質，男性霸權或民族主義的教化還是不可或缺的。

相反的，雖然〈月嚶〉中的「她」與丈夫，從小受的是日文教育，丈夫也在故事裡好幾次表示，使用日語感到更加自在，然而，〈月嚶〉的敘事卻依賴一種匿名的精緻北京話，以及中文現代主義。對於〈月嚶〉所欲貼近的有教養女性主體來說，「語言」並不是障礙或麻煩，純粹的女性觀點中甚至不需要安排讓前一個被驅逐的民族共同體透過母語（日語）現身，該篇的普世性現代主義美學所保證的，質地纖細的情緒流動、還有比什麼吶喊都更加嘹亮的「沉默」，就足以讓「性別」這個範疇完整自足，而不需要放大（即使是殖民者的）「文化」刻印在女人身體裡的那種東西。對「現代女人」來說，更重要的東西顯然是，她在現代社會中，沒辦法不察覺到的、因為父權政體與婚姻制度而帶來的那種寂寞與疏離。所以，〈月嚶〉使用中文或日文是無關緊要的，因為重點是「現代主義敘事」能否準確把握住（中產階級）女性的迷惘與懷疑，而郭松棻那憂鬱唯美的文學語言，也成功地繼承了歐陽子、陳若曦從很早以來，在戰後臺灣女性小說傳統中確立的「高度自省女性」所依賴的敘事腔調。於是，〈月嚶〉的感染力就在於深刻的女性內在情感，例如這篇小說中藉由沉默所展現的，指向父權的憤怒。同時，對於現代主義筆法下的女性身分來說，重點在於洶湧的潛意識與反思，而不是《懷鄉》中因為貧困匱缺、根本性地被不利社經條件所制約的「統治者意識形態」。還可以更加延伸：隨著臺灣歷史繼續往現代性前進，

《懷鄉》（台北：麥田，2014），頁 89。

⁴⁵ 里慕伊·阿紀（Rimuy Aki），〈小公主〉，《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 小說卷》，頁 146-147。

〈月暉〉裡的中產階級漢人女性「更自覺」、「更女性主義」了，可是，《懷鄉》裡的底層原住民女人則被國家與市場馴服，反而開始同化於父權體制下的通俗女人形象。不言而喻的就是，「她」與「懷湘」這兩個女人為什麼被不同的語言策略所傳達？為什麼一位聰明獨立，另一位則是忠貞賢淑充滿傳統婦德？這當然肇因於她們大相逕庭的階級屬性與文化資本。如果女性文學追問的是，「女人」之所以獨立或從屬的可能條件，那麼我們就看到，比較此二部小說而言，女人們所身處的社會階層，似乎就決定了一個女人到底能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女性主義者」。

其實，作為殖民歷史、性別體制、經濟階層中的最下位者，文本之外的臺灣原住民婦女，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儘管解嚴以來，婦女運動與原住民運動逐漸蓬勃，然而，作為族群運動的原住民運動，主要由男性主導、並有著強烈的陽剛氣質；而作為女權運動的婦女運動，則更關心漢人中產階級女性的困境。於是，原住民女性的獨特需要，例如部落女性的貧窮問題，反而在婦權運動與族群運動中被邊緣化、「被禮遇但是卻隔離待遇」⁴⁶，儘管這兩者都會聲稱，原住民女性是該運動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這與史碧娃克筆下的印度婦女有些相像，當英國殖民政府與擁護民族主義的本土中產階級都宣稱要「代言」印度婦女利益之時，卻又各自將自己的政治計畫加諸其上，最終，符號上的「再現」(re-presentation)與政治上的「為其發言」(speaking for)這兩個層次，就這樣被混淆了，知識分子筆下的從屬者最後很容易只是「進步」、「發展主義」的懸絲傀儡，他們不能為自己發言。⁴⁷

若我們依循此思路，來反思臺灣文學史的情形，那麼，在當代女性小說中，頻繁出現的「女性主義主體」，就可能會侵奪了那些「非女性主義女性主體」好不容易才打開的一點點發言空間。因為知識分子所偏愛的「女人」範疇，其實只是一小部分，相對上有能力免疫於父權意識形態的菁英女性。而當慎思勇敢的女人成為學術評論與文學創作的典型角色時，那些不符合標準的，普通、庸俗的女人，就會因為「美學上粗糙簡單」或是「政治上平板反動」等理由，而消失於被我們稱為文學的這個充滿再現慾望的論述空間裡。⁴⁸

⁴⁶ 謝若蘭、拉娃·布興，〈無聲婦運：原住民族婦女關注議題與原運參與〉，陳瑤華主編，《臺灣婦女處境白皮書：2014年》，頁419。

⁴⁷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張君政譯，〈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頁294-296。

⁴⁸ 本文的其中一篇審查意見指出，在臺灣文學史中，包括現代主義在內，各種美

所以，對於更容易欣賞郭松棻的知識階層或學院讀者來說，在我們閱讀各種性別文本時，例如優美深邃的〈月暈〉，就必須無時無刻提醒自己，所謂高度政治化的「女性」感知，很可能同時也隱隱要求在階級上更為優越的特定群體。當〈月暈〉選用孤絕冷僻的現代主義美學來擔任其敘事聲音，其實也就僅僅代表了，此美學所偏愛的是受過良好教育、善於反思的中產階級，而不是那些被國家或是父權體制干擾操控的廣大庶民。⁴⁹一方面，〈月暈〉裡的女性角色，因其階級位置而顯得更有能動性，另一方面，〈月暈〉也更容易激發菁英讀者之讚許。社會學者余貞誼就觀察到，在接觸過女性主義思想的高社經地位女性中，她們時常透過反思來檢查自己的性別政治敏銳度。⁵⁰從好的方面來說，這是女性自覺地在日常生活中召喚公共議題，但對於「甚麼是好的文學？」、「文學作品如何再現女性形象」這樣一個與「知識分子嘗試報導他者」相關的特定問題來說，「去階級」的「女性主義敘事框架」，有時候反而成了一種侷限。

並置且比較〈月暈〉與《懷鄉》兩篇小說，我們能獲得許多啟發。《懷鄉》之所以在政治與美學上沒那麼「女性主義」，也許可以說，很大程度是因為其敘事並未從生活現場抽離，「懷湘的生命故事」本來就是個別女人的所思所想，而非揭露整體的性別宰制結構。如果用文化人類學家的話來

學流派均有關於底層女性的描寫；另一方面，Rimuy Aki 也絕對不是出身社會底層的作家。這是很寶貴的提醒，庶民女性形象確實是本土文學創作的重要題材，而且，我們也不能夠僅僅從「作者出身」來判定一部文學文本的階級屬性。這裡需要稍微解釋的是：在本文看來，臺灣小說中那種充滿知識分子批判的「女性主義主體」，即便是以階級位置較低的女性作為敘事者或描寫對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遠離了「接受既有世界觀、難以意識到性別政治之迫切性」的常民觀點。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作家們為了表達女性主義批判，而蓄意賦予故事中女性人物擁有看穿、識破、甚至顛覆父權意識形態的角色能動性，這事實上也是許多臺灣女性小說所選用的敘事策略。

⁴⁹ 就本文所舉的幾個例子而言，不同女性小說中「性別自覺」的程度，也反映在女性主角是否「現身」一事之上。例如，〈新黨十九日〉、〈月暈〉裡的中產階級主人公都僅以「她」而非真實姓名來代稱，並且小說敘事有意地疏離於主角內在，用以彰顯性別身分在女性主義敘事中的普遍性。相反的是《懷鄉》與〈相思子花〉，農工階層的懷湘與阿鳳都是血肉具足、有名有姓的角色，並且小說敘事絲毫不吝於認同、重合於主角的心境。我的看法是，當小說被視為政治文本時，越是純粹的女性主義敘事，就愈容易選擇訴諸客觀、普遍、而非單一案例的敘事腔調，以求證成性別政治的有效性。這個特色在那些尤其專注性別問題的作者，例如成英妹、朱國珍等人身上，都能夠觀察到。

⁵⁰ 余貞誼，〈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女性主義認同與實踐的敘事建構〉，《臺灣社會學》第 21 期（2011），頁 101-156。

說，這麼做的好處就是「把他們置於他們自己的日常系統中，就會使他們變得可以理解」⁵¹，對於不管是學術研究或文學寫作這樣的知識分子式的「再現」工作而言，為了理解階級他者，很要緊地就是認識到，其性別觀點與生活世界是無從分割的。但是〈月暎〉不然，現代主義美學路徑已經預設了，文學的任務在於傳達女性「真正的」心聲（深層真實正是現代主義重視的東西），其所召喚的是都市中的女人、受過教育的女人、中產階級的女人，換句話說，是那些後設地思考「女人是甚麼」的女人。但我們必須警覺，在〈月暎〉裡，「她」成長於開設玻璃工廠的資產階級家庭，在日治時期能夠上學、能書寫流暢日文、甚至能鑑賞隔壁鄰居演奏貝多芬的奏鳴曲。這些都給了「她」面對婚姻之宰制本質的勇氣與智力。但是，《懷鄉》裡的「懷湘」，過著很不一樣的生活，照顧接二連三出生的嬰兒、幫忙繁雜農事、冬季時接受林務局零工到寒冷深山採收香菇、半夜逃離家暴丈夫縮在灌木叢下抱著小狗無處可去……也難怪「懷湘」沒辦法對性別關係提出反思，她的追尋總是經濟的、女性化的、私領域的。這裡的分歧也許可以這樣解讀：上述矛盾可以是內在於「女性」這整個被壓迫群體之中的：那些由階級地位帶來的，存在第三世界社會內部的不平等，也造成了在性別意識上大相逕庭的「複數的女人們」。

透過這兩篇小說中，「有性別意識的女人／服從社會陳規的女人」、「抗議的女人／賢淑的女人」之對照，我希望可以勾勒出，當代臺灣小說中（較受主流認可的）女性主題與（較少被著墨的）階級問題兩者之間的張力。我們已經看到，〈月暎〉這樣的傑作常常預設了知識份子的階級位置，這與我們學院讀者的詮釋視野，其實太貼近了，甚至近到讓我們覺得，所謂「女性小說」就應該是那種「通向」性別政治的小說，而不是庶民女性他們自己所評價跟感受到的世界。⁵²相反的，像《懷鄉》這樣在寫作技巧上

⁵¹ Clifford Geertz, 韓莉譯,〈深描說：邁向文化的解釋理論〉,《文化的解釋》(南京:譯林,2008),頁18。

⁵² 關於「知識份子觀點」與「庶民女性心聲」兩者間的矛盾，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李昂《自傳の小説》。儘管這部作品試圖揉合民俗鄉野傳說與女革命家謝雪紅波瀾萬丈的一生，以恢復被男性霸權所隱瞞的女性歷史，然而，林欣儀與楊翠卻都指出的，李昂的嘗試並不成功，作家本人所代表的知識份子敘事過於強大，底層勞動女性的聲音並未真正現身。可參考林欣儀，《勞動·老化·殘缺——九〇年代以降華文女性小說中的身體》(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頁75-76。以及楊翠,〈「妖精」的自傳、「女人」的小說:論李昂《自傳の小説》中的性記憶文本〉,《興大人文學報》第32期(2002),頁256-258。

看似「平實樸素」的作品，反而有其視野上的深刻與政治上的激進。不同於一般女性小說中，亟欲控訴父權宰制的女性主義敘事；也不同原住民小說中，追索哀悼「部落傳統的失落」，《懷湘》作為一篇「底層」的原住民女性小說，反而指出了底層女性在現代階級社會中的一些重要內在質地：她們必須與民族國家和性別刻板印象等等意識形態共存、必須在父權家庭結構中尋求安身立命之地。

六、結論

即使是侈言解放的啟蒙時代，「性別」就已經被銘刻進某種不公正的二元論了。按照哲學家 Carole Pateman，當啟蒙思想家開始設想人類社會生活之起點的時候，男人和女人間的權力差距，就因為根深蒂固的性別分工，而被構思出來。由於男性具有好戰、侵略、理性等品質，因此他們活動於國家治理、生產貿易或是政治爭鬥的公共世界裡；相反的，女性的天職是照護與情感，她們似乎根本不被視為參與「社會契約」的締結者，直接被留在家庭與私領域的高牆當中。⁵³

這樣說來，整個現代性計畫，根本不是中立的，它有著性別化的世界觀，男人才是掌握公領域的那一半人類。也因此，既然家庭與私領域，終究成為特定性別的牢籠，也難怪恩格斯要說，只有當婦女不再受困於家務勞動，並且能夠自由進入經濟生產的時候，女性的解放才得以可能。⁵⁴

然而，上述恩格斯的觀點，其實不只是「性別的」：在資本主義的征途上，女人作為家父長的財產、男人免費地享用女人為了維持家庭而付出的血汗、女人作為補充用的並且用過即丟（因為她們最終要回到家庭）的勞動力、女人作為孕育並教養新一代勞動力的生物單位，這些不可忽視的經濟性格，都緊密地重塑了當代社會的性別不平等圖像。換句話說，我們不能把「性與性別」看作是自足的範疇，在實際的歷史過程中，性別不平等深深依賴著既有的階級體系、社會分層、物質與勞動的分配，才能夠順暢運作。而所謂「女性」，也不是單一的社會身分，白種與黑人、中產與勞工、已開發國家與未開發國家等等不同情境中的女人，她們各自要面對的狀況也是高度異質的。⁵⁵

⁵³ Carole Pateman, *The sexual contract*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88).

⁵⁴ Friedrich Von Engels,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北京：中共中央馬克思著作編譯局，1999），頁 168。

⁵⁵ Nira Yuval-Davis, *Gender & nation* (London: SAGE, 1997), p.119.

因此，本文嘗試在臺灣當代小說文本中，指出性別與階級議題的會合之處。在前面，我們已經觸及了，女人在家庭與職場中遭遇的壓迫、女人在資本主義歷史裡的解放與壓抑、「浪漫愛」作為一種回應階級社會的私密情感、還有性別身分與階級位置之間彼此鑲嵌的動態過程。我們並且提問，為何在 90 年代後，儘管臺灣小說中的女性書寫大放異彩，但那些貼近父權的女性（她們常常是底層女性），反而無法現身？本文所期許的方向是，透過上述的初步探索，能夠在既有的性別研究之中，刺激一種更重視階級、經濟過程還有性別內部異質性的左翼文學批評，也許這能夠在純粹的「女性觀點」之外，再提出一些有益補充。

引用書目

- 尹慶春、簡文吟，〈已婚婦女的持續就業：家庭制度與勞動市場的妥協〉，《臺灣社會學》第1期（2001），頁149-182。
- 朱天心，〈新黨十九日〉，邵儂編，《八十七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1990）。
- ，《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麥田，1992）。
- 朱天文，《世紀末的華麗》（台北：遠流，1992）。
- 邱貴芬，《仲介臺灣·女人》（台北：元尊文化，1997）。
- 成英姝，《公主徹夜未眠》（台北：聯合文學，1994）。
- 里慕伊·阿紀（Rimuy Aki），〈小公主〉，孫大川編，《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 小說卷》（台北：印刻出版社，2003），頁127-148。
- ，〈懷湘〉，孫大川編，《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 小說卷》（台北：印刻出版社，2003），頁149-166。
- ，《懷鄉》（台北：麥田，2014）。
- 余貞誼，〈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女性主義認同與實踐的敘事建構〉，《臺灣社會學》第21期（2001），頁101-156。
- 何明修，〈臺灣工會運動中的男子氣概〉，臺灣女性學學會、張盈堃、吳嘉麗編，《陽剛氣質：國外論述與臺灣經驗》（高雄：巨流，2012），頁349-382。
- 林欣儀，《勞動·老化·殘缺——九〇年代以降華文女性小說中的身體》（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
- 林宜滢，《人人愛讀喜劇》（台北：遠流出版社，1990）。
- 范銘如，《眾裡尋她：臺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2003）。
- ，〈女性為什麼不寫鄉土〉，《臺灣文學學報》第23期（2013），頁1-28。
- 唐文慧，〈為何職業婦女決定離職？結構限制下的母職認同與實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85期（2011），頁201-265。
- 郭松棻著，陳萬益編，《郭松棻集》（台北：前衛，1993）。
- 許博任，〈浮濫圈地之成因及其抵抗〉，《臺灣人權學刊》第2卷第3期（2014），頁159-167。
-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
- 陳映真，《萬商帝君》（台北：人間出版社，1995）。

- 張晉芬，〈綿綿此恨，可有絕期？——女性工作困境剖析〉，劉毓秀主編，
《臺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年》（台北：時報文化，1995），頁 89-120。
- ，〈性別勞動平權的進步與檢討〉，陳瑤華主編，《臺灣婦女處境白皮書：2014年》（台北：女書文化，2014），頁數 171-201。
- 楊青矗，《工廠人》（高雄：敦理，1975）。
- 楊翠，〈「妖精」的自傳、「女人」的小說：論李昂《自傳の小説》中的性記憶文本〉，《興大人文學報》第 32 期（2002），頁 247-275。
- ，〈文化中國，地理臺灣〉，《臺灣文學學報》第 7 期（2002），頁 1-41。
- 董維良，〈小說初讀九則〉，陳萬益編，《郭松棻集》，頁 550-564。
- 鄭清文，《相思子花》（台北：麥田，1992）。
- 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論解嚴以來的臺灣小說〉，陳建忠、應鳳凰、邱貴芬、張誦聖、劉亮雅著，《臺灣小說史論》（台北：麥田，2007），頁 335-413。
- 劉戈，《灰姑娘與灰公子模式成因探析：英國求婚小說和中國才子佳人小說比較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
- Braudel, Fernand, 施康強、顧良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台北：貓頭鷹，1999）。
- Engels, Friedrich Von,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北京：中共中央馬克思著作編譯局，1999）。
- Geertz, Clifford, 韓莉譯，《文化的解釋》（南京：譯林，2008）。
- Harvey, David, 黃煜文譯，《巴黎，現代性之都》（台北：群學，2007）。
- Kerbo, Harold R., 《社會分層與不平等：歷史、比較、全球視角下的階級衝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張君玫譯，《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台北：群學，2006）。
- Watt, Ian, 魯燕萍譯，《小說的興起》（台北：桂冠出版社，1984）。
- Brah, Avtar. "Unemployment and Racism: Asian Young on the Dole." In *The Experience of Unemployment*, edited by Sheila Allen, Basingstoke, 61-78. London: Macmillan, 1986.
- Goldthorpe, John H. and Robert Erikson.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Hamilton, Roberta.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A Study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London: G. Allen & Unwin, 1978.

- Hartmann, Heidi.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In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edited by L. Sargent, 1-42. London: Pluto, 1981.
- Pateman, Carole. *The Sexual Contrac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 Rubin, Gayle.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edited by Rayna R. Reiter, 157-210. 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 Secombe, Wally. "The Housewife and Her Labour Under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83 (1974): 1-22.
- Skeggs, Beverley. *Formations of Class and Gender: Becoming Respectable*. London: SAGE, 1997.
- Westwood, Sallie. *All day, Every Day: Factory and Family in the Making of Women's liv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
- Yuval-Davis, Nira. *Gender & nation*. London: SAGE, 1997.

The Encounter of Capitalism with Women of Taiwan —Reflection on the Theme of Wome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Fiction from a Class Perspective

Lin, Yun-Hung*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numerous exceptional works of women's fiction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aiwan, inspiring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scholarship concerned with gender issues. This article, however, analyzes contemporary women's fiction from Taiwan, as well as its class-related aspects of gender issues,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 a somewhat lesser-used approach in studies on Taiwan literature. Firstl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atriarchal ideology simultaneously at work in the workplace and in the family, relegating women to a lesser remuneration for their labor than they deserve in bo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Next, it deals with the notion of romantic love in literary works - a theme that transcends gendered intimate feelings and responds to the hierarchy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Finally, this work investigate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mutual constraints between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gender awareness, which often create tension between class and gender in women's fictional narratives from Taiwan. Many texts favor bourgeois, gendered subjects who are progressive, and consciously reflect on gender relations; rarely portrayed are the experiences of those subaltern women whose tendency is to compromise with or even internalize patriarchy. I argue that critical analyses of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Transitional Justice Commission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Taiwan fiction must take into account class issues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furthermore, they must also carefully address the issue of subaltern women who may be ignored, silenced and even made to disappear amid gendered political correctness.

Keywords: women's fiction of Taiwan; class consciousness; gender identity; romantic love; subaltern women

